

技术理性的反思

——论《圣洁百合》中的科技伦理观

徐世博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46)

摘要: 小说《圣洁百合》中到处渗透着电影等现代科技的痕迹。在这个技术主宰的时代里,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工具化了。由此带来的信仰的缺失、社会关系的冷漠和家庭内部的裂痕,预示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厄普代克对此作出了深刻的伦理反思,辩证地对待技术理性这一问题。哈贝马斯的技术哲学理论能够为厄普代克小说中的社会交往行为的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只有从他者的角度出发,在平等交往、真诚对话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共识”。小说中克拉克最后的选择就是站在他者的位置上作出的道德判断。厄普代克的小说传达的正是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辩证统一。技术与人文之间需要保持这样一种平衡。

关键词: 工具化; 伦理; 技术理性; 交往行为; 人文理性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4)03-0144-07

约翰·厄普代克(1932—2009年)贯以性爱、宗教和艺术为小说主题来描写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并成功地刻画出了“兔子”等经典文学形象。他的作品屡获大奖,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代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就曾写到,“约翰·厄普代克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一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和随笔家,也是杰出的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他是,也将成为国家的珍宝,丝毫不会逊色于他19世纪的先驱纳撒尼尔·霍桑。”^[1]与霍桑相提并论,这对厄普代克来说是极大的殊荣,但他却也当之无愧。原因在于他的写作与霍桑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红字》三部曲”就是对霍桑的《红字》进行了改写。同样从宗教的角度出发,但厄普代克在部分继承霍桑代表的美国传统的同时,质疑了传统的道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霍桑。此外,他们对于科技发展的态度也不甚相同。短篇小说《拉帕希尼的女儿》等作品展现出的是科技的罪恶及其对人性的扭曲,也就是说,霍桑对科技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厄普代克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试运用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技术哲学理论对厄普代克的《圣洁百合》进行阐释,意在揭示小说中体现出的厄普代克对待科技的辩证的伦理观。

一、科技百年:工具理性的时代

厄普代克的很多小说都插入了对历史史实的

记述,具有史诗般的气势,如“兔子系列小说”就描述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近50年的美国文化图景。评论家斯希夫认为,“通过生动的人物塑造,对于时代和历史——无论是具体的时间还是地点——的成功再现,在民族性方面体现的广度以及小说本身拥有的容量,‘兔子系列小说’是一部用散文写成的史诗。”^[2]同样,历史跨度近百年的《圣洁百合》(1996)一书更是被视为厄普代克后期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厄普代克沿袭了他一贯的路数,“以家庭为单位,以个人为对象,透过家庭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变化来折射社会和时代的风云变幻。”^[3]小说叙述了发生在一家四代人身上的故事。面对科技和各种新思潮的发展,克拉伦斯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放弃了牧师的职位,生活窘迫的他常常转向电影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最后抑郁而终;儿子泰德目睹了父亲的消沉,变得中规中矩,过着平淡的生活;孙女埃茜从小在父母的疼爱下长大,怀揣着对电影的憧憬,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却忽视了儿子克拉克的感受;克拉克在遭遇现实的各种挫败后,转向了宗教,却不幸误入邪教,最终为了挽救他人而失去了生命。克拉伦斯一家四代人的经历,反映了美国百年的宗教以及电影等科技的变迁。一些批评家预测该小说将被视为,“那种在它的时代被忽视或者被机械表彰的晚期杰作,它的价值只有留给另一代人来重新发现”^[4]。

“圣洁百合”这一小说题目选自南北战争时期朱莉亚·豪的《共和国战歌》，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该小说同厄普代克其他一些小说一样与宗教有关。牧师克拉伦斯信仰的丧失预示着宗教的由盛到衰。许多评论家就此从历史和宗教等视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以电影等科技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为着眼点的还比较少，这也是研究该小说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61]，《圣洁百合》的故事就主要发生在这一段时间，涉及了从20世纪初机器大生产下资本家和工人间的矛盾，到后来电影和体育等文化产业的技术化和商业化，其中还插入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试管婴儿和人工受精等一系列高新科技的接受情况，使得技术(工具)、理性与伦理的关系变得格外错综复杂。

技术正式进入人类历史以18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为起点，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电子技术完成了初期发展。18世纪60年代末，瓦特蒸汽机的问世及运用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使得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实现了向机器大工业的转换。这一突飞猛进的科技进步可以从与克拉伦斯吃晚饭的教堂建筑需求委员会委员们的一次讨论中获悉。委员会主席迪尔霍尔特是“一个拥有30个雇员的小纺织厂老板，有12台织布机，还雇有一个行家专门挑机器和工人的毛病。”^[62]他对技术革新的时代极为拥护，“我认为对美国来说这是格外的美事之秋，对帕特森市也一样。纺织业全面上升，火车工业走出低谷的事实也像我坐在这里一样地肯定……”^[62]。纺织业的发展毫无疑问繁荣了经济，也给人们带来了好处和便利，就像迪尔霍尔特所说，过去只有绅士才买得起的套装，现在普通人也办得到了。然而，复杂机器的使用也伴随着工人劳动量的“加载”以及失业率的提高等现象出现。可迪尔霍尔特等人对此的态度却是极其坦然且冷漠，委员麦克德莫特就炫耀说，“(加载)意味着提高操作人员与机器的比例，人们对机器进行了种种成功的改进，提高比例已经可以办到了。第一次改进是在18世纪80年代，它改变了手工操作，近来又发明了在线或纬线断了的时候自动停机的方法。以前，你瞧，工人必须自己把机器停下来。现在一个人可以同时操作2台机器而不再是1台，所以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62-25]“干多少活，拿多少工钱”，看似合理、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隐藏的却是资本家对不占有资本的劳工的无情剥削。原纺织工人克莱斯特一针见血地反驳道，“可远远达不到双倍的工资，……虽然他

们干了双份的工作。”他接着又补充说，“机器的所有者受益，这毫无疑问。可那些为了多挣钱而接受加载的工人没过多久便发现，他们的工资又回到原处，而操作的机器却多了一倍。”^[625]这也就是说，科学的技术化、社会化的结果是技术的定量分析、工具效率、知识专门化的标准支配着整个社会和文化，人类进入海德格尔所谓的“技术时代”“宰制的世界”^[7]。

小说中到处都渗透着各式技术的痕迹。克拉伦斯那一代就经历了一个马车被汽车代替的时代，深夜中他时常感到，“马蹄的嗒嗒声，马车的铁皮轮子轧在鹅卵石路面的隆隆声与百老汇大街上渐渐远去的有轨电车声交织在一起，还传来阵阵发闷的类似咳嗽声，那是不用马拉的车——或者叫发动机车的——马达燃烧时发出的灰心丧气的噗噗声——主要是福特T型和奥尔兹车……”^[637]。技术(工具)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占了主导地位。那什么是“理性”呢？马尔库塞认为“理性”是一个历史地变化着的概念，“它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批判能力，即它原是一种批判的理性；而在自然科学中，理性的概念已被技术的进步所支配，它的批判性逐步为工具性所取代。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已成为当代理性主义的趋势。”^[8]工具理性的表现就是把技术进步看做是社会合理化的推动力量，强调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按照技术规则来管理和统治社会。以迪尔霍尔特为代表的资本家们就被这种所谓的工具理性的观念所左右了。

机械工业化的结果是，物质条件有所提高的同时，生活压力也逐渐加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影视等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电影成了当时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贯穿了小说的始末。第1章中辞去了牧师职位，失去了金钱和地位的克拉伦斯，迫于生活压力，当了一名推销员。生意惨淡的他，白天就常躲进开放的电影院。早期的电影(1926年前)是无声的，“大多数的无声影片都会以钢琴、风琴，甚至整个管弦乐团演奏的音乐伴随放映，声音的效果粗略地配合着银幕上的动作。”^[9]同克拉伦斯一起看电影的人多是来自社会底层，闪烁不定的图像使得他们暂时忘记了残酷的现实。厄普代克不忘在讲述人物与电影相关经历的同时，穿插对电影技术本身发展的介绍，“电影最初拍摄的都是舞台剧和在音乐厅上演的节目，看电影就跟坐在剧院第一排看演出一样，可是随着电影业逐年发展，人们掌握了精巧灵活的表现手法，发明了自己的词汇如剪切、淡入淡出、近距离拍摄、移动拍摄和

推摄等。”^{[6]95}这种叙述方式说明厄普代克对科技是持有一种喜忧参半的矛盾情怀的。电影对第二代的特迪(泰德)没有多么重要,只是他曾用来与妻子艾米丽约会、消遣的一种方式。可对于女儿埃茜来说,却是她的全部。第3章也主要围绕埃茜的成长和她在影视圈的发展展开的。这一阶段的电影早已进入了有声的阶段,技术进一步改进,“过去的硝酸酯纤维胶片既易燃又会因长期保存而粉化,自从1950年以来电影业有了新的发展,现在使用的是醋酸纤维,从理论上讲这种胶片既不易燃烧又能长期保存。”^{[6]301}这一技术发展的结果是,毕克馥(小说开头出现的著名女演员)的大部分影片都已不复存在,但是阿尔玛(埃茜)的却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些电影业相关细节的记述如此细致,使得整个小说看起来就如同是一部完整的电影发展史。而实际上也如此,电影在这本小说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只是影响着普通观众的精神生活,还掌控着演艺人员的命运。阿尔玛的一位有经验的搭档库柏就曾劝诫她道,“不要抗争,……相信机器的作用,否则你会跟我一样遍体鳞伤。好几百人投入到一部电影的拍摄中来。你已经看到了——80个人制作布景和灯光。你的工作就是熟悉台词,在摄影机前恰到好处地表演2个小时。”^{[6]286}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体育运动作为一项新兴产业,也同电影一样,逐渐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特迪的哥哥贾里德,一个投机者,把科罗拉多的一座山的山坡改建成了滑雪场。特迪的外孙子克拉克由于在影视圈发展不顺利,曾经在那儿当过一段时间的缆车工。小说的第4章就是主要来写克拉克的。克拉克后来离开滑雪场,是因为他发现,“由于周末人太多缆车便高速运行,致使座椅在上下乘客的圆盘上前后甩动,像大砍刀一样打在等候的滑雪者背上。坐在中间的游客由于无法抓到两边的扶手,受到的威胁最大。”^{[6]331}他向负责人约翰尼示意放慢速度,得到的回应却是更快的速度,以及冷冰冰的声音,“机器造的就是这么快”。他又向大老爷贾里德反映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得到的同样是敷衍的、极不负责任的答复,“你的工作就是不让这种事发生。”^{[6]333}可见,无论是体育,还是电影,在机械技术控制的社会里,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商业化了,人与人之间本应和谐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二、伦理困境:两种极端的表现

工具理性的普遍化曾带来了技术与工业的巨

大进步,然而,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同时亦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技术统治,人本身也逐渐失去了主体性而被对象化,成为机器的附属物,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其结果就是,“作为现代分工体系中的一个角色,人的独特需要与情感受到了无情的漠视。”^[10]面对这样的伦理困境,小说《圣洁百合》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迪尔霍尔特、阿尔玛等为代表的“科技至上”说,另一种则是以耶瑟及其教徒为代表的“科技倒退”说。

(一)“科技至上”说

20世纪以来,科学的泛化与技术的统治使得人们的目标与追求集中在对物的占有和消费上。“物”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准则,人的精神世界垮塌了,人成为“单向度”的存在物,“人的‘物化’问题,是当代愈益突出和最为根本的‘全球’问题。”^[11]

以迪尔霍尔特为代表的资本家,掌握着大量的工业资本,享受着机器进步带来的收益,在讨论纺织业发展问题时,大赞科技,“欢迎工业革命”,另一位同仁麦克德莫特也附和道,“发明是促使向好处发展的力量,……它已经使世界比以前好了10倍,而且还会更好,相信你我吧。”^{[6]28}不过,过度的科技化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同克拉伦斯等人一起吃晚饭的卡拉威罗太太,就提出了异议。她的丈夫曾经是一个印染厂主的助手,因为工作环境恶劣,又总是接触有毒的化学物质,所以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她抱怨说,“那些化学物质一旦沾到皮肤上任何肥皂都洗不下来,能将人手上的皮肤活活剥掉。”^{[6]22}而这些资本家只注重机器生产,不但无视工作环境和化学试剂对劳动工人造成的危害,还克扣工人工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冷漠。克拉伦斯就是意识到,他所信仰的上帝面对这种状况无能为力的现实后,才决定从神职上退下来的。

机器工业时代不仅导致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也造成了家庭伦理关系上的裂痕。厄普代克在与莱利的一次访谈中就表达了自己对此的忧虑,“恐怕在美国我们正在失去家庭作为延续性的意义。”^{[12]236}阿尔玛和儿子克拉克就是一个例子。先天残疾的艾米丽对能生出身体健康的小埃茜(阿尔玛)而感到十分的庆幸,对女儿宠爱有加。从小就享受着家庭温暖的阿尔玛,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追寻着她的明星梦。她根本无法意识到缺少母爱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电影对于阿尔玛来说就是一切,她绝不会放弃任何一次演戏的机会,也不会放弃任何一次出风头的机会。她就像机器一样,被电影业推动着不断前行。在得知自己儿子被卷入宗教

狂人的重大事件时,她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不能回去,还要拍3个星期,都是我的戏!”^[641]后来还是在经纪人的催促下才去向世人展示一个母亲的“爱心”。在与克拉克通话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居然又聊起了她的电影。克拉克一句,“妈,打电话进来不能超过3分钟。”^[643]充分显示了他作为这样一个工作狂的儿子的无奈。就克拉克之事接受记者采访时,阿尔玛更是极其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她“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回答着,十分小心不让自己口吃,也不使自己在闪光灯前眨眼。”^[649]对工作如此上心的阿尔玛,在对自己儿子教育问题上的付出却是少之又少的。早些时候每当朋友让他谈谈自己的母亲,克拉克就总是说,“除了周末我很少见到她。每天我起床上学之前她就离开了家,很多时候我睡了觉她还没有回来。”^[6325]母子长期缺少必要的沟通,不知道孩子需要的是什麼。这也是为什么无人管束的克拉克会接连陷入与女孩子的瓜葛、毒品问题,以及车祸等各种麻烦中,并最终误入歧途的根本所在。克拉克在后来与邪教头目耶瑟的接触中,也曾说出了对自己母亲的真实看法,“她在银幕上演的妈妈可比当我的真妈好多了——那么温柔,那么活泼,对孩子和孩子的需要了解得一清二楚。”^[6346]对于自己的生父拉兹罗(阿尔玛的第二任丈夫),克拉克也没有多好的印象,“对他(拉兹罗)而言,做父亲只意味着晚上带孩子去道杰体育场看一场球赛,在蔡森饭店开个生日晚会,去希尔克莱斯特俱乐部打一场网球,在斯特里普街上的卡尼餐馆吃两个低脂肪蘑菇汉堡包,或者,几年以后,在拉布里坚石咖啡厅试着用点兴奋剂。”^[6375]令人沮丧的是,父亲不但没有与儿子适当地交流,还经常在外面与女人鬼混。父母关系紧张,再加上与子女缺少交流,往往导致孩子性格偏执,易走极端。这也是工具理性社会下,家庭内部常出现的一种道德状况。那么什么样的家庭关系才能称得上融洽呢?在克拉克看来,阿尔玛历任丈夫中“最像父亲的父亲”是雷克斯(第三任)。因为只有他会和克拉克在放学后去打棒球,会表示鼓励而不是埋怨,“别慌,别慌……想好了再打,小超人”,顶多是一句,“他(克拉克)太急于求成了。”^[6328]可见,对孩子单一的物质满足是远远不够的,精神上的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可母亲的这次婚姻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了,留给克拉克的是无尽的伤痛。

理性精神“虽然确证了人作为自在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却无法确证人作为自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过分强调技术理性的意义,就会把世界变成一

个机械的、冰冷的物的世界,把人变成物化的、没有批判性、超越性和创造性的自然人。”^[13]“科技至上”是一种对工具的盲目拥护和崇拜,它也是工具理性的核心思想。这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往往导致人际关系恶化,使人们陷入伦理的困境之中。以霍尔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就对这种工具理性作出了批判,“人际关系的非自然化是一个完全被管制的社会即将到来的前提条件。这是一个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为名,根据工具理性统治和管理专家特权来组织的社会。产生增长和进步的过程,远离了可能的政治批判,成为了绝对的目的。”^[1478]

(二)“科技倒退”说

“技术理性”中“物对于人的价值优先性”导致严重的后果:即现实社会生活成为人与人争夺物质财富的过程,这导致社会裂痕的加大与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仇恨。究其原因,人类虽然有强烈的“技术崇拜”,但技术恰恰难以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因为“偶然性与存在的抉择无法靠技术解决。……靠技术对环境的支配而克服命运的偶然性,其实无济于事,因为世界的规定性是无限的,技术把握不住偶然性,……幸运与不幸的偶然性不能以概念方式把握。”^[15]这样看来,霍尔海默和阿多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工具理性的要害。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就此对科技进行全盘否定呢?科学技术难道真的没有它的存在价值吗?《圣洁百合》中的耶瑟及其教徒的极端行为就为此作出了回答。

克拉克离开了滑雪场,在偶遇的一个叫哈娜的女孩的带领下到了一个名为“圣殿”的地方。这是一个看不出多少现代化痕迹的地方,“小木房有的封了顶,有的刚刚装上竖板条,用两英寸宽的板条横向固定住,看上去像鸡舍似的……灯光是浅橘黄色的,显然是煤油灯发出的光而不是电灯。”^[6339]哈娜给克拉克吃的是,“一碗很稠的扁豆粥、一块自制粗面包和一盘辣酱梨片”,她说,“梨是农场的老梨树结的,由圣殿里的妇女负责保存到现在。”^[6347]住在“圣殿”的大概将近40人,他们在精神领袖耶瑟的“爱心和教诲”信条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自然的居住环境,纯天然的食物,互助的生活方式,在工业化污染严重和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美好。可事实果真如此吗?真的应该让科技倒退回去吗?小说随后的发展揭示出了事实的真相。答案是否定的。生活环境和饮食的自然化本应无可厚非,但耶瑟这样做,并非从生态或者人的更

好生存的角度出发,而是要对“圣殿”的人们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控制,来达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耶瑟的“爱心”表现为,“圣殿里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媳妇。”^[6349],而“教诲”就是向人们(儿童也不例外)传授自己对《圣经》的解释,以及宣扬他所谓的“总结算日”的到来。

克拉克的迷失并非偶然,是工业社会里人的普遍自私化乃至人际关系的冷漠化造成的。这在以往给克拉克的电话留言中就不难看出,留言全是些“向他索要什么的内容,没有一条是要给他点什么的”^[6391]。对一切失去了信心的克拉克期待耶瑟的“圣殿”可以带给他真正的生存意义。可事实正好相反。克拉克入住不久,几位来访者前来询问“圣殿”房产税缴纳及儿童受教育等情况,双方观念不同引发冲突,耶瑟便唆使信徒路加等人向来到“他们领地”的人开枪,致人死亡,使得内外关系紧张起来。遭到围困的耶瑟丝毫没有退让的打算,他让男人武装起来,还封闭了“圣殿”。事实证明耶瑟假想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完全是行不通的。缺少外界的供给和充足的储备,“圣殿”的生活日趋艰难起来。当耶瑟发现自己的谎言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又假借《圣经》之意,高声说,“送他们走吧,孩子们!让他们自由吧!”^[6436]接着用煤油泼向木房,并让其他极端分子向“圣殿”的妇女和儿童开枪。这时,耶瑟邪教组织的虚假和凶残本质已暴露无疑。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对工具化的他们居然私藏了各式高科技枪械。于是,鼓吹的“科技倒退”说也就不攻自破了。这样看来,一味地拥护或批判工具理性的做法都不可取,需要辩证地看问题。

三、辩证的科技伦理观:人文理性的融入

1936年,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在《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口号,认为必须找到将科学和我们的文化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的办法,“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16]也就是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如何保持这种平衡呢?更重要的是“建立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作用的有效机制。”^[17]同样,较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工具理性批判,把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有所不同,哈贝马斯早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前言里就对马尔库塞的观点“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18]进行了辩论。哈贝马斯没有单纯地批评科学技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或

对启蒙以来的科学技术及整个现代科学思想进行彻底的否定,而是要实现一种理性的重建。

哈贝马斯的不同论断是,“尽管工具理性的确形成了现代工业社会运行的一些操纵机构——特别是那些由金钱和权力推动的过程——这些社会也能够产生,的确必须产生交往合理性的形式,从而使它们能够处理社会复杂问题的同时,也推动综合性地参与。”^[14187]也就是说,实行中的工具理性有边缘化、剥削和强制性和解的趋势,交往合理化则使得相互理解得以达成。小说中,克拉克就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交流的重要性,他曾就有人举报“圣殿”里虐待儿童一事,劝诫耶瑟道,“你需要有更好的公共关系。”^[6365]后来事态严重后,联邦调查局的狄克斯先生也表示过,“我们要和平解决问题,全面交流是必要的途径。”^[6419]不难看出,良好的公共关系是要通过交往来实现的。

而道德又是交往行为得以发生并持续下去的基本条件,哈贝马斯的出发点是这样假定的:“道德意识”就是使用相互作用的能力自觉地研究道德上至关重要的行为冲突的能力。对于用共识解决一个行为冲突来说,当然需要一种能够共识的观点,借助于这种能够共识的观点,就可以建立起一种调节有争议的利益的过渡性的程序。但是,有决断能力的行动主体在不依赖于社会出身、传统和基本态度等等的偶然的共同性的情况下,只有当一种基本观点本身产生于可能的相互作用的结构时,才能对于这种基本观点取得一致认识。这种基本观点,就是行动着的主体之间的相互性。”^[19]

小说中沉浸在那种不切实际的、粗俗的“原始”生活中的克拉克,像“圣殿”的其他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被“洗脑”了,然而他时不时地还能表现出一点理智。比如说虽然痛恨现代社会的工具过度理性化,但以扫(克拉克)并没有完全否认科技手段的价值,与警方僵持阶段“圣殿”仅有的现代化工具——“一台电脑、一张塑料贴面电脑桌、几个文件柜和一台激光打印机,还在通往下河的那条沥青路上引来电话线”^[6384],就是在克拉克的劝说下买回来的。然而,遗憾的是,虽然有了交流工具,可是由于耶瑟及其部分手下缺乏“道德意识”,双方迟迟无法达成哈贝马斯所说的“共识”。

关于“共识”的问题,哈贝马斯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我提出的话语伦理学所主张的恰恰是:话语的共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的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

人人都必须怀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不但如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起来的规则,还必须为所有人遵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的实行所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在这里,话语行为的三大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起着决定性作用。”^{[20]29} 这样看来,内外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直接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在儿童受教育问题上出现分歧和冲突时,耶瑟的手下路加首先采用了暴力的方式,用枪射向校车。之后,他们也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妥,反而更加肆无忌惮,打死了开警车前来了解情况的警务人员,使得形势进一步恶化。

那么“共识”就意味着一方要向另一方无条件妥协吗?“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哈贝马斯继续道,“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识绝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话语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话语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的实现获得保证。”^{[20]29} 这里哈贝马斯重点强调的是“真正的共识绝对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也就是说,耶瑟等人高喊的“宗教自由”和“携枪自由”在美国社会是允许的、合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此为幌子,散布虚假言论,伤及他人性命,这种“差异”和“多元性”也是要有个限度的。

而话语真实性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它的主体间性。即是说,“只有在话语主体的交往对话中,话语的真实性才能得到检验。当所有人都进入平等对话,并就同一话语对象进行理性的探讨与论证,最后达成共识时,该话语才可被看作是真实的。因此,真实性乃是话语交往中的三种有效性要求之一以及这一要求的实现。当然,为了达成有效、真实的共识,每一个话语主体还必须从理性动机出发,严格遵循普遍认同的话语规则和论证程序,表现出共同探求真理的真诚态度和愿望。”^{[20]30}

“真实”或“真诚”在工具化的社会里是很难找寻的。克拉克之所以会下决心跟从耶瑟,也就是因为看重了这一点。克拉克以为在“圣殿”自己能够被理解,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而克拉克看到的却都

是假象,是狡猾的耶瑟绞尽脑汁地找到了克拉克的软肋,并假装“真诚”地去接近他,拉拢他。直到“圣殿”的储备不足,人们忍饥挨饿,耶瑟以神祇为名放火烧屋,并开始残杀妇女和儿童之时,克拉克才彻底地清醒过来,意识到他们的话毫无真实性可言,看清了耶瑟等人的丑恶面目。整个“圣殿”被火海所包围,耶瑟仍在虚假地“传道”,外面的人很难马上冲进来,这样耗下去,“圣殿”中的人只有两个结果:不是被大火活活烧死,就是被耶瑟用枪打死。面对这种危机局面,克拉克毅然决然地拿起了枪,打死了邪教头目耶瑟,示意“圣殿”那些无知的人们到外面世界去,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自己却被耶瑟的一个手下打死。克拉克的选择加入了他的道德判断,“使他自己远离了美国世俗的思想,认为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你生活的任务就是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服用任何必要药剂来保住你的工作和生命。”^{[12]237}

克拉伦斯放弃神职后,每日消极度日;而克拉克在发现自己信奉的教义的虚假时,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当失去了宗教神学的支撑后,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基础何在是道德哲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哈贝马斯的出发点是康德的先验道德哲学。他说,“康德的潜在出发点是:在作出道德判断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而把自己转换到他者的位置上。但是,如果参与者再也不能依靠关于同质生活状态的先验沟通,那么,道德视角也就只能根据交往的前提而付诸实现。这些前提确保了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自我理解 and 世界理解出发,检验一下普通规范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绝对命令就获得了一种话语理论的解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话语原则‘D’,根据这个原则,只有那些得到话语实践参与者认可的规范才可能具有有效性。”^[21] 克拉克最后的选择就是站在他者的位置上做出的。

《圣洁百合》以邪教组织的覆灭和“圣殿”的人们获救结尾,留给我们的是对“技术理性”的伦理反思。在1978年进行的一次访谈中,厄普代克重申了他眼中作家的“道德观”与表现现实的关系:“(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道德观是尽量要写得确切,要讲述你所知道的真实,而不是像牧师在教坛上布道那样。”^[22] 厄普代克通过《圣洁百合》真实地展现了自己对工具、理性和伦理之间关系的辩证的思考。人的工具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信仰的缺失、社会关系的冷漠和家庭内部的裂痕,但科技倒退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站在他者的位置上,通过真诚交流来达成“共识”,从而实现

如萨顿,特别是哈贝马斯所主张的,“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辩证统一。社会发展需要的是“在客观公正地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注意到生活中更本质的方面,因为人不但是物质文化的创造者,同时

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23]。此外,小说中对于生态环境等细节的描写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的考量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Christopher Lehmann-Haupt. Lyrical writer of the middle class dies at 76[N/OL]. New York Times, 2009-01-28.
- [2] James Schiff. John Updike revisited[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8: 8.
- [3] 金衡山. 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40.
- [4] Adam Gopnik. Postscript: John Updike[J]. The New Yorker, 2009-02-09.
- [5] 伽达默尔. 科学时代的理性[M]. 薛华,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61.
- [6] 厄普代克. 圣洁百合[M]. 袁凤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7] 郑晓松. 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 2007: 61.
- [8] 陈振明. 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50-51.
- [9] 汤普森. 世界电影史[M]. 陈旭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58.
- [10] 谢魁. 技术异化与人的主体性失落——西方技术哲学一瞥 [C]// 李志祥. 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6: 23.
- [11] 孙正聿. 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J]. 社会科学辑刊, 2003(5): 9-16.
- [12] Charlie Reilly. An interview with John Updike[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2, 43(2): 217-248.
- [13] 衣俊卿. 20世纪的文化批判[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7.
- [14] Darrow Schecter. The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from Weber to Habermas [M].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 2010.
- [15] 科斯洛夫斯基. 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 毛怡红,译. 北京:中央编译局, 1999: 54.
- [16] 萨顿. 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M]. 陈恒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125.
- [17] 孙伟平. 科技与人文:断裂与重建[C]// 李志祥. 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06: 20.
- [18]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李黎,郭官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1.
- [19] 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 郭官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77.
- [20] 章国锋. 哈贝马斯访谈录[J]. 外国文学评论, 2000(1): 27-32.
- [21] 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6.
- [22] James Plath. Conversation with John Updike[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120.
- [23] 车凤成. 索尔·贝娄作品的伦理道德世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0.

The Retrospection of Instrumental Reason

—On the Ethical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XU Shib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race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ch as films everywhere in the fiction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In an age manipulated by technology, to a certain extent, man is instrumentalized. This brings about the loss of faith, the indifference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rifts within families, which anticipates the unprecedented living crises. Updike had an ethical retrospection on this, treating the iss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dialectically. Habermas's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philosophy could make a rational explanation for the result of social communicative actions displayed in Updike's fiction: only when one starts from the other's angle, based on equal and sincere communications, could a “consensus” be reached. In the fiction, Clark's final choice is the moral judgment made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other. What Updike's fiction conveys is ju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should be the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instrumental reason and human rationality. Science and humanity need to keep such a kind of balance.

Key words: instrumentalized; ethics; instrumental reason; communicative action; human rationality

[责任编辑:孟青]